

■新作聚焦

李迪报告文学《丹东看守所的故事》 在大墙内播撒人性温暖

□彭程

读李迪《丹东看守所的故事》，是一次灵魂备受感动的过程。感动于辽宁省丹东市看守所人员为本、实行人性化管理的先进事迹，感动于看守所领导和普通干警为了社会的稳定和谐而默默奉献的高尚情操。

这部报告文学，为我们呈现了一个特殊的场所：看守所，一个特殊的人群：等待判决的在押犯人。在外人眼中，看守所是一个神秘的地方，高墙之内的生活鲜为人知，潜意识中总是和冰冷、压抑、恐惧的氛围相联系。但这部作品却让我们了解到，在丹东看守所里，生活呈现出和传说完全不同的一种面貌。看守所的在押人员是触犯了刑律的人，理应受到法律的惩罚，但在这里，管教人员在严肃执法的同时，也给刚性的法律融入了柔性的情感。我们看到，丹东看守所的干警，本着“教育、感化、挽救”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博大爱心和真挚感情，用春风化雨般的细致和耐心，感化犯人，挽救犯人，让那些万念俱灰的在押人员，重新产生了对生命的信念；对那些死刑犯，则让他们用有尊严的方式告别生命，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程。用戴晓军所长的话就是：“要让他们生活在希望中，人没希望就成了绝望。哪怕被判了死刑，也要在死前尽量满足他们的愿望，不能让他带着怨恨离开这个世界。”他们的爱心和付出，深深感动了在押人员，温暖了他们的灵

魂，对稳定他们的情绪，对劳动改造的顺利进行，也对他们将来的重返社会，都产生了积极良好的效果，自然，也对维护社会的稳定有着重要的作用。

一部成功的文学作品，当然要传递作者的某种思想、某个理念，但首先必定是用情感打动人的，这是文学的本质和功能之所在。或者换言之，只有首先做到了打动人心，才能更好地传达思想和理念。读这部报告文学，始终沉浸在深深的感动之中，欲罢不能。全书通过描绘出不少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更通过一系列鲜活生动的故事、情节、细节，展示了看守所管教们的爱心和责任感，也展示了在押犯人被这种爱和关心所深深打动、灵魂深处发生蜕变的过程。

在《鸭绿江畔的山》中，管教韩峰发现一位异国在押人员因不会说中国话无法与人沟通而精神郁闷，马上冒着大雪跑到书店买了《朝汉词典》送给他，使其感动得流泪。管教陈贵东带70多岁的在押人员李中去医院看病时，没有电梯，他就背着李中从一楼到四楼爬上爬下，累出一身大汗。李中感动地说，我活到70岁，还没有人这么背过我呀。类似这样的做法，对丹东看守所的干警们来说实在是再平凡不过了，不值一提，但因其实朴素就更加动人，在打动在押犯人的同时，

也无疑能够有力地叩击读者的心灵。《风中，那一把红雨伞》更是把民警对在押人员的细心体贴、悲悯情怀和内心的善良表现得酣畅淋漓，感人至深。被评为“我最喜爱的十大人民警察”的女管教王晶，以其倾心付出而获得了女死刑犯周杰的信任，打开了她封闭已久的心扉。在死刑很快要执行而后者尚不知情的情况下，王晶主动问她喜欢什么衣服，自己掏钱为她买了一套运动衣，并安排监室的人给她洗了个热水澡，以便她能整洁干净地走向刑场。王晶的行动中包含了即将逝去的生命的痛惜，包含了对人的尊严的维护，即便这个生命是属于一个罪犯的。为了满足死刑犯和生身父母见一面的愿望，她发动家人多方寻找，终于找到，并在押赴刑场执行之前，想方设法使周杰遥遥地见了年迈的老人一面。她信守周杰所做的承诺，像女儿一样为周杰的二老送终，像母亲一样照顾周杰的孩子。这篇不长的作品中，有对生命误入歧途铸下大错却无法挽回的痛惜，有对干警美好心灵的刻画，都令人动容，催人泪下。

书中的第一篇《等你到天亮》颇有些当下流行的悬疑文学的因素，结构布局巧妙，叙述一波三折，充满了悬念。一开始，就通过一幅鲜明的画面把读者的目光牢牢吸引了：冬天的寒冷早晨，看守所铁门下坐着一个人。接下来

用倒叙的手法，交代了在押人员西宝犯罪的经过，他和妻子玉珠何以离婚，他与妻子复婚的梦想是否能够实现，等等，整篇作品仿佛一篇精彩的短篇小说。管教魏红召和妻子为了他们两人能够复婚而煞费苦心，甚至点燃了许愿灯，更是让人感动。

因篇幅所限，不举更多的例子。但这些已足以说明，在这部报告文学集中，文学的手段得到了很充分的运用和调动，产生了很强的艺术感染效果。不论是人物对话、内心独白，还是场景刻画、细节描写等等，都十分生动、传神，不少篇章写出了管教和囚犯的个性，展现了他们感情和精神的世界，特别是对于干警的博爱情神、悲悯情怀给予了充分的体现。

正是经由这些生动的描写，读者能够强烈地感受到，在这些令人感动的事迹的背后，有着管教们对于自己的岗位和职责的忠诚，有着对于自己的工作意义和价值的深刻理解，有着对于国家和民族的一份忠诚。在艰苦的条件下，他们用自己的一言一行构建和谐社会的大厦添砖加瓦。犯罪分子本来是与社会对抗的、对稳定和谐产生破坏性作用的人群，但在这里，却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在干警们的关心和帮助下，很多人被成功地感化，服从改造，愿意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读来让人欣慰，也充分证明了“教育、感化、挽救”的监管政策的巨大效果。

阅读这部作品，同样也为作家李迪不辞辛劳、深入生活进行创作的行动深深感动。年逾花甲的作家两年中七赴丹东，两次在看守所过春节，深入管教所采访，让我们看到了作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意识。这部作品的成功也再次佐证了一点：优秀的文学作品，是拥抱生活的产物，是作者爱心的凝结。文学，必须从生活的深井中挖掘，才真正具有生命力，才能够迸发出打动人心之力。

等，既说明了抗战歌曲的重要意义，也说明了收集工作的广泛影响。

□李运持

打捞逐渐远去的历史

■短评

作为广西首部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25万字的报告文学《世纪大救亡——闾培桐与抗战歌曲的毕生情缘》(以下简称《世纪大救亡》，广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1月出版)的面世，既是作者谭小萍个人创作的可喜收获和广西报告文学的重要成果，也是近年中国报告文学一部值得关注的作品。具体而言，可以从三个方面归纳该作的文本价值和创作特征。

一、具有独特历史文化价值的选题。描述闾培桐呕心沥血“打捞”抗战歌曲的《世纪大救亡》，其选题不仅独特，而且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抗战歌曲本身就是一种具有特殊文化形态的战时文化文献。主人公闾培桐的人生经历也具有相当感人的传奇色彩。这不仅因他历经艰难，花费大量心血去收集整理抗战歌曲，充满激情到处传唱抗战歌曲，还在于作为抗战英烈闾维雍将军之子，其父辈家庭和个人经历都具有非同寻常的传奇色彩。“北大荒歌王”与沈阳农学院“第一把好嗓子”的美誉说明闾培桐是个具有天赋的音乐人才，同时，闾培桐青壮年时期所历经的种种磨难，也是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写照。

二、“全景图”的报告。从《世纪大救亡》结构方式、角度选择和信息量看，明显属“全景图”写法。首先，《世纪大救亡》采取了一种纵横交织的结构，作品共12章，虽然副标题突出了“闾培桐与抗战歌曲的毕生情缘”的主题，但可以看出其生命远不限于抗战歌曲情缘。第一章“铭记与遗忘”是历史背景交代，强调了抗战歌曲汇编的意义；第二章“烽火中的童年”描述了闾培桐童年时代的烽火战争、国事家事和对音乐的喜爱；第三章到第七章，展示了闾培桐青壮年时期的磨难和难得的幸

也许因为有过亲身的创作经历，我对报告文学作者一直心存敬佩，惺惺相惜。一篇三五千字的报告文学，往往需要付出三五天深入细致的采访。采访的深度和强度决定了文章的成败。报告文学写作对作者是意志和毅力的考验。我虽然没有与林璇面谈过她的人生，但从她的“知青”经历，已隐约窥探到她热爱生命、拥抱改革开放的豪放情怀。我虽不知她的年龄，但从履历上推算，她继续写作时已年过不惑，绝大多数人在这个年龄段上已是歌喉不爽、笔头不畅。然而也许正是经历使然，她却从不唱不爽，不书不畅。于是，报告文学的园地里，多了一位步履轻盈、声亮音润的歌手。

林璇的可贵，还在于她有近距离反映现实生活的勇气。她的作品写的几乎都是发生在汕头市的人和事，伸手可及。这样的写作当然有其方便之处，但稍有误差，也可能引致误解和非议。相信她曾有过这样的遭遇或顾虑。然而，也许她写作的初衷正是出于对身边现实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的怦然心动，出于对改革开放的感恩，她才显得格外的从容，格外的义无反顾。为改革开放而歌唱，成了林璇的人生使命。

林璇的写作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2004年以前。这一时期多是一些两三千字的作品，与其说是报告文学，不如说是文学特写。我一直认为，越短的文章越难写。试想，

福；从第九章“打捞逐渐远去的历史”才开始正面展示主人公收集整理抗战歌曲的艰辛工作。《世纪大救亡》既是一部长篇报告文学，也是一部关于闾培桐完整人生的人物传记。

这种完整描述闾培桐人生经历的纵向结构，不仅能够刻画血肉丰满的主人公，更重要的是能够说明闾培桐收集抗战歌曲并非心血来潮，而是与其人生经历有密切关系。无论其英烈父亲，还是母亲和姐姐，对闾培桐收集抗战歌曲都产生了明显促进动力。第三章到第七章对闾培桐青壮年经历的展示同样必要。闾培桐收集抗战歌曲，除家庭影响和爱国情怀，还与他热爱歌唱和自身的音乐天赋有关，如他对民间歌曲和外国歌曲就有相当了解。

在纵向结构中，作品同时展开了横向的描述与交代，而且非常注意角度选择。《世纪大救亡》除第六、第七和第十章只有两节，其他各章都有三节或三节以上。章节安排明显有内容多寡的考虑，但无论多寡，作者总是尽可能从多种角度切入，使内容覆盖面更广阔些。比如正面展示闾培桐收集整理抗战歌曲的第九章“打捞逐渐远去的历史”，选择的三个角度就比较全面地描述了主人公得到海内外同胞鼎力相助的感人状况。闾培桐虽然不少时间在独自奋战，但关键时刻得到了各方支持。其中既有政府部门和新闻单位的支持，更有亲朋好友和民间人士的帮助。比如闾培桐的好友、学者郑也夫就做了很多具体工作，特别是《抗战歌曲汇编》的出版，完全得益于郑也夫、时寅和王康的鼎力相助。这种横向展开在第十章“歌声悠长，记忆悠长”中同样突出。如第二节“云中，谁人频寄锦书来”展示了8封书信，写信者包括音乐家、教授、将军后、海外同胞

真情的歌唱

□廖琪

在两三千字的篇幅里，由一个片段或一个情景，反映出一种风采、一种精神、一种情感，这有多难，需要多么深厚的动力。林璇对于典型性的理解，对于生活细节的捕捉，无疑都有自己的心得。《妈妈和“无敌牌”》把“无敌牌”缝纫机贯穿全文，写活了母亲对整个家族默默无闻、然而又无处不在的爱，抒发了作者对母亲的无限感激和深深的眷恋。

每个作家都有过入门的艰涩，但过了这一关，前边就是放歌歌唱的自由天地了。

以《创造“金刚”奇迹的人》在广东省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岁月如歌”大型征文竞赛获奖为标志，林璇第二阶段的报告文学写作，全面地走向成熟。

在一边写作一边学习的过程中，林璇对传统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已十分娴熟。抒写优秀人物的短篇报告文学，难就难在如何从一开篇就抓住读者的心，引导读者一口气读下去。生活是多姿多彩的，反映生活的文学作品从来就没有固定化了的开篇布局。草率开篇，无异于自毁作品的可读性和生命力。为了有一个有创意的开篇，不知难倒过多少写作者。然而，林璇这一阶

■关注

将作家以十年为届做代际划分，惟一的好处是用以报刊标题，方便、醒目。虽然我对这一略显粗率的命名并不认同，却也能理解。它从一个角度，折射出近两三代30年，中国社会在迅速而深刻地变化着，以至于出生不过相差数百周的人，就拥有了迥然不同的成长环境和文化资源，进而影响到他们作品的整体样貌。这是一种从现象到现象的简单的比附思维，社会生活和文化遗产与作家的关系，不是染缸和布匹，丢进染缸里出来的就是蓝布。

时至今日，以“0”后为标志的命名在丧失市场价值之后也成了旧话，出于讨论的方便，我们沿用这一称谓，但我将“70后”作家定义为：在中国文学结束上世纪80年代所谓“黄金时期”之后，开始文学实践、与中国的市场经济和消费文化一起成长的、非典型化写作的青年作家。

所有整体性概念都是可疑的，他们，或者说我们，因为我在“他们”之中之间的相异远远大于相似。然而，因为时间轴上的刻度被归类的“我们”，无疑有着某种共同的命运。

我们面对着一个“全媒体时代”，“十分尴尬”。我们的评论家观察到的是：“被淹没感”往往替代了先锋新锐的意识感受力，被媒体牵引着关注社会热点和重大事件，纠缠于复杂沉重的社会现实与平凡无力的个人生存之间……整体上却呈现出某种程度的犹疑、徘徊和无力感”(郭艳《全媒体时代的青年写作及其境遇》)。我认同这样的描述。一方面，发达的传媒和海量的信息，渗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价值多元多得近乎虚无，小说家那一点儿可怜的个人经验和想象力，在中心离散、碎片化且以几何基数自我复制的现实面前，如同遭遇通货膨胀的货币，迅速贬值，生活变得比小说更小说；另一方面，叙事虚构已经成为产值巨大的文化工业，从事严肃叙事的小说艺术，边缘化得再推一推就掉进死亡之渊了——我们进退维谷，处境尴尬。

面对市场、面对传媒表达出刚烈决绝的纯文学立场的小说家，我充满敬意，但我认为，“坚守”，“独立”，这样不现实主义又殉道色彩的表达，只是对文学的抒情，而非建设性的认识，更不是摆脱尴尬处境的道路。当我们的小说叙事正在逐渐失去掌握现实的能力时，我们守在哪里，立于何处？

“小说的叙事因素或讲故事的能力，表面上看似似乎只是被文化工业、被电影、电视连续剧和报纸副刊上的通俗连载小说取代了。其实小说叙事形式的真正深刻的危机恰恰在于：我们身处其中的复杂的历史现实已经不再能够使用经典的小说叙述模式来加以描述”(耿占春《叙事美学》)。换言之，我们掌握的叙事方式，已无法掌握今天的现实，它失效了。我们的“无力”、“犹疑”、“徘徊”，固然有很多自身的、具体原因值得检讨，但叙事本身的危机，我们拥有的叙事方式正在失效，却是更值得思考的深层原因。

以贯穿中外文学史的小说题材——穷人的苦难为例，我们笔下的穷人在暧昧、淡淡、支离破碎的现实里，不明不白地受着苦。我们被质问：在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展现出的作家伟大的同情心，哪儿去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闪闪光名宇所代表的那份担当现实苦难的作家的良心，哪儿去了？

低头摸摸，我们的良心肯定在。只是我们的穷人，是市场上的穷人，在一个制度化、世俗化、市场化的社会里，穷人的苦难只能是分配和再分配这样的经济问题，是社会福利和个就起征点问题，是政治民主、法律完善问题……一旦开启这个合理化进程，一切不过是时间问题，在此过程中，新闻记者可以随时发言，小说家如果不想提行，那说什么是有意義的？

如果我们在虚构叙事中还保有对真实的追求，那么就无法给予那些“被羞辱被损害”的穷人以道德上的优越感，更无法给予他们天国的光辉，当然，也没有能力把他们变成进步力量的象征，给予历史发展必然性的光明暗示，我们只能把他们书写为偶然的、卑微的、可怜甚至可笑的、意义微弱的一个受苦人的故事。而且我们的“一件小事”里，不再出现那个从皮袍下压榨出“小”来的“我”，启蒙赋予那个“我”的力量，在今天同样失效了。

于是，我们返回自我的个体经验——这是“70后”作家、特别是女作家经常被人诟病的一点。我们悲哀地发现，曾在现代主义小说实践中因折射人类普遍精神困境而熠熠生辉的个体经验，在我们手里变得黯淡晦涩，难以与读者交流。不能苛求读者，他们正兴致盎然地跟着电视镜头寻找失踪的卡扎菲呢。在技术释放的巨大力量面前，我们的经验贬值了。

固然如此，我们也未必就是“生于末世运偏消”，在我们的尴尬和困难里，也许埋伏着有待发现的可能性。全文探讨小说的叙事危机和未来的可能性，不是这篇文字所能完成的任务。但我们寻求创作上的突破，在思考认识、态度乃至技术上的问题之外，以开放的姿态，做一些关于小说本体的思考，是非常必要的。小说的历史，某种意义上就是叙事“失效”与寻找新的可能性的历史——当巴尔扎克的方式失效时，福楼拜给了它新的可能性；当追求心理真实的意识流实践走向末路时，魔幻开始介入现实……小说这一文体的强大的自我更新能力，是由历代作家在充分继承文学遗产的前提下赋予的。用李敬泽的话说，“文学没有重新开始”，小说也不会从头再来，我们新的可能性，一定与悠久的人类叙事史密切相关。

微博是“全媒体时代”的典型代表，但即时分享的只是信息，真实生命经验却被隔绝。信息造成了我们“经验的贫乏”(本雅明语)。小说的虚构叙事却有穿越媒介之间、抵达虚构寓言的存在真实的可能性。在我有限的思考里，《红楼梦》和《我的名字叫红》这样的小说颇具启示性。《红楼梦》是作家动用中国所有精神遗产来进行的叙事冒险，“百科全书”绝不只是社会历史意义上的比喻；而帕穆勒则向我们展现了当下个体的经验穿越古老文化、打开人类生活的能力。于是，我想象这样一种小说：它以极具吸引力的故事和极富个人色彩的修辞，在真实世界和“太虚幻境”之间形成叙事空间，以复杂、多义文本与变动不居的现时性和人类历史时间构成对位的互文关系……完成这样叙事的作家，既洞明世事，了解现实，又拥有伟大的梦想，通晓虚构的魔力。

□计文君

『七〇后』的尴尬与可能

■新作快评

时代需要『海姆立克急救』

□晓翔

铁凝《海姆立克急救》
《江南》2011年第3期

何谓“海姆立克急救”？铁凝在这篇小说中告诉我们，所谓海姆立克急救，指的是“一种异物卡住气管后的腹部冲击急救法”，其原理为：“在人的两肺下端残留着一部分气体。如果冲击腹部，可以使残留气体形成一股强烈气流，这股气流长驱直入气管，就能将卡在气管或喉咙部的异物冲出。”那么，究竟谁需要海姆立克急救，又该如何展开急救？借用这一医学术语，铁凝不仅营造了小说的核心意象，而且给出了她对于时代症候的诊断。

一切始于一场家庭变故。艾理发现了丈夫郭现的外遇，外遇的对象是他的中学同学马端端。郭现经营着一家不大的家装设计公司，市场生存压力大。郭现的出轨，虽然带给艾理“持续的不快、焦虑，以及凄厉的疼痛感”，但出于不给丈夫事业“添乱”的动机，艾理起初并未点破，而是以自己的隐忍期待着丈夫回心转意。一次独自的外出旅行，使艾理顷刻间卸去了长久以来的忧恼与怨愤，她检视内心，重新清楚地意识到对丈夫的爱，奔涌而出的柔情使她下决心要跟丈夫开诚布公地说出心里话。然而，谈话并未顺着她设定的方向进行，交谈中，丈夫的敷衍、不诚恳、不认错的态度激起了她的愤怒，她怒极而笑，却不慎被鸡块卡住了气管，窒息身亡。在此变故之后，追悔中的郭现偶尔从报纸上读到一则“海姆立克急救法”，他约上马端端，两人依葫芦画瓢，开始了一场惊心动魄的互救与自救的模拟行动……

在铁凝近期的小说中，这篇《海姆立克急救》是少有的严厉与峻急之作，严厉是源于批判性，而峻急则因为意识到“急救”的紧迫性。一条生命无端消逝，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艾理的死亡？表面看来，这是一场意外事故，而事实上，艾理的死却是因为爱，是因为丈夫郭现对这爱的背叛，更因为郭现对背叛的过错不以为然、不以之为耻的态度，这些事实上都构成了对她灵魂的杀戮。作者以其擅长的细节描写勾勒出艾理“较真儿”的品性。艾理年少时的“话剧梦”因为频繁“笑场”而终结，而在生活中，她也并非一位好演员，她无法始终扮演面对丈夫的背叛一味隐忍纵容、并将其出轨行为合理化的“好妻子”角色，她演着演着就“笑场”了，她的愤怒喷涌而出。

而我们的时代是不是有太多的逢场作戏，有太多的“好演员”？这到底是不是一种“正确的”生命态度？作者显然并没有停留在对于婚外情的简单的道德批判，尽管婚外情似乎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而是将笔力深入到这种社会病症的根源，在作者看来，也许导致婚外情泛滥的恰恰不是真情，而是一种游戏的、不认真不严肃的、苟且式的情感态度与生命态度。

仿佛是一种反讽，在一场模拟的海姆立克急救中，郭现却表现出过分的认真投入。正是在这一直面生死的严肃时刻，郭现认清了他与马端端的婚外情的性质：“即使她的沧桑与时尚、通达与不羁真的吸引过他，那吸引也只是次要的、多余的吸引。那热烈也只是次要的、多余的热烈。婚姻之外的业余快乐吧？这个时代好像并不特别谴责类似这类的‘业余快乐’。他从来没有想过要为此抛弃自己的家庭。”“业余快乐”可谓一语中的，道出了许多偷情者，特别是男性偷情者的心理。这是一种摒弃了责任与担当的、相当轻松的“业余快乐”，而关键是，“这个时代好像并不特别谴责类似这类的‘业余快乐’”，因为这种不打算抛弃妻子、只为寻求调剂的行为被很多人认为是无害的，时代给偷情者提供了宽松的社会氛围，这到底是时代的开放，还是时代的堕落？

而郭现过度认真投入的态度，也带动了马端端，在惊恐中引发了她对于两人关系的严肃反省，而她的自省无疑来得更加深刻：“她第一次见识了她的认真和急赤白脸的投入，也终于正视了自己和他之间的确是并不认真的，他们之间有过愉悦，一种相互不承担责任的愉悦。他不是她的婚姻目标，她的目标远比他要壮大。但她害怕孤单，他填补了她这个阶段的害怕。直到艾理出事之前，他和她还没有打算点破彼此，或者他们一直默契地逃避着这种点破。就在刚才，她有点惊悚地发现，从人格层面审视，他们对这‘默契’的马虎拖延，比他们之间生出真爱更加糟糕。”从一名关心人类心灵的作家的角度而言，在婚姻之外产生恋情，固然不是道德的，但是比这更不道德的是对于两性关系的游戏与敷衍的态度，而这种态度却正在成为当前社会的一大病症。作者刺中了我们这个时代情感中冷漠的、麻木的神经，这种批判可谓严厉。

但作者并没有止于批判，她同样提供了救赎的可能。尽管是一场模拟的海姆立克急救，却被操练得动人心魄，颇具仪式感。它带出了人物的灵魂之痛，也反映了他们强烈的忏悔与救赎的意愿。铁凝在诸多小说中都表现了人物的“伦理自觉”，或许在作者看来，整个社会道德的重建与维系都有赖于个体的“伦理自觉”。而对于我们的时代而言，铁凝的这篇小说也可谓是一次海姆立克急救。时代呼唤严肃认真的生命情感，时代需要海姆立克急救。